



陈 涌 著

鲁迅论



2 039 7078 3

鲁迅论

陈 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鲁迅论

luxun lu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3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9}{16}$ 插页 2

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 10019·3657

定价 1.05 元

出版说明

为适应我国鲁迅研究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我们将陆续选编已往鲁迅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论文，以个人集和多人集的方式出版。这套书力求能反映出我国鲁迅研究的主要的学术成果，可资研究界参考和借鉴，以期有助于鲁迅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书中所收文章，除部分录自报刊外，多数从已出版的各种文集中选出。

本书收入陈涌同志多年来撰写的研究鲁迅的主要论文十二篇，出版前经过作者校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6905/24

目 录

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1
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	26
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	38
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	80
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130
关于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	152
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	174
鲁迅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	211
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	232
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	262
《阿Q正传》引起的争论	
——在巴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论文	296
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活动的开端	313
后记	334

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毛泽东选集·五四运动》）

数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些话的正确。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有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认清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之后，便抛弃了原来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且终身为这个思想所指示的方向奋斗，而鲁迅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鲁迅一生经历着中国两个革命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从年青的时候起，便目击了中国人民深受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痛苦。而在他一生的漫长的岁月里，鲁迅把他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为实现一个理想的新中国的斗争。鲁迅的思想，正是在长久复杂残酷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过程中锻炼并发展起来的。

鲁迅生长在一个小康的封建家庭里，但封建家庭的生活并没有使少年的鲁迅感到多少快乐。封建的教育只能束缚儿童的

活泼的天性的发展。父亲过分严格的有时甚至不近情理的管束，在少年的鲁迅心里曾经造成极其苦痛的印象^①。而在家庭以外所见到的世故、自私的市侩性格，也使少年的鲁迅开始体验到旧的人世的险恶。在单调的童年生活中，使鲁迅感到慰藉的是他对于自然界和对于艺术的爱好。但是，当他第一次翻阅到二十四孝图“老莱娱亲”、“郭巨埋儿”这类画页时，由于反常的、矫揉造作的宣传封建道德而引起本能的厌恶，少年的鲁迅很快便把这些篇页翻转过去，并且从此不愿意再看第二次。

民间的艺术使少年的鲁迅开始受到人民精神的感染，开始在他身上注入一种和他本来的阶级血统不相容的血液。鲁迅在后来回忆到他少年时看戏的情景说：

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面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朝花夕拾·无常》）

但比民间艺术对鲁迅更有决定的影响的是他和农民子弟的实际接触。鲁迅母亲的娘家是在农村，这使少年的鲁迅能有和农民子弟接近的机会。在和农民子弟接近中间，使少年的鲁迅认识了农民的知识丰富，认识了他们本性中的可爱的部分。而这些正是他在有钱人家子弟中间看不到的。在《故乡》这篇小说里，鲁迅曾经这样回忆一个叫闰土的乡下孩子道：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

① 参看《朝花夕拾·五猖会》。

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但鲁迅同时也开始看到，在封建制度下的农民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的，这便打破了他从封建教育得来的对农民错误的看法^①。

但当鲁迅十六岁时，他父亲的死却给他家庭的生活以很大的打击。而此后，由于家庭经济陷入困顿所遇到的周围的奸诈、虚伪，更刺痛了少年的鲁迅的心。本来已经对自己的环境厌倦了的他，这时便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这是不难看出这位少年人的决绝的态度的。

那时正是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政变结束后不久。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使中国迅速走向半殖民地化的重要的步骤，而戊戌政变的悲剧的收束又等于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完全破产。但一方面是无穷的苦难，一方面对于真理的如饥似渴的探索。当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的革命思想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间正发生广泛的影响，它也很自然地吸引了正在不满于他的环境的鲁迅。

但在他一八九八年进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里，鲁迅所学的除了英文之外，便几乎只有那原封不动的古文。学校当局几乎都是些封建迷信昏聩糊涂的人物。为了两个学生在游泳时淹死，他们便把学校的游泳池填平，在上面盖起一座镇压魔鬼的关帝庙，每年七月十五还请和尚来大放其焰口。当时的所谓“新学”的

①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说：“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

人物是不乏这样可笑的。鲁迅后来回忆起这学校时给它的结论是“乌烟瘴气”。于是第二年便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在这里，鲁迅算是开始接触到外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地质学、矿物学，特别是赫胥黎的《天演论》给鲁迅非常新鲜的印象。新的思想完全抓住了年青的鲁迅的心，他不顾别人的警告而贪婪读着他所能发现的、旧民主主义时代所能有的一切进步书籍，这里包括着《时务报》、《译学丛书》等等。

但是，改良主义注定要失败的事实甚至也在年青的鲁迅的面前暴露。原来矿路学堂是为了一个叫青龙山的煤矿而设的。这个煤矿由于管理腐败，“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朝花夕拾·琐记》）在这种生产得不到赢利的情况下，矿路学堂便被认为没有必要而遭到裁撤。

青龙山煤矿和矿路学堂可悲的命运正象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业的可悲的命运，也象征着中国改良主义的可悲的命运，自然鲁迅在这时又经历了一次失望的苦痛。

然而鲁迅暂时还没有完全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只是鲁迅在它上面涂抹着单纯的近于幻想的爱国主义的色彩。一九〇二年，鲁迅带着一种朴素的、献身于自己祖国的决心到了日本。他选择了学医：“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但在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之前，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却有机会读了大量科学、文学和哲学的著作。由于对祖国命运的热烈的关注，也由于他性格里那种深刻、敏感的性质，他经常和他的朋友谈到一些在同辈中是很少考虑到的关于国民性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阿Q正

传》以及其他批判中国落后思想的著作的观念的萌芽。

那时日本东京几乎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宣传与组织的一个中心，正在兴起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一九〇四年成立了同盟会，出版革命的报刊《民报》，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进行激烈的斗争，而国内的革命武装起义又正此起彼落。青年的鲁迅也被卷入了当时革命的浪潮。“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从鲁迅自己这简单的记述里，便可以想象得到青年的鲁迅当时的风貌。

一九〇四年，也就是鲁迅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离开了东京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这里，鲁迅一方面得到了象藤野先生这样崇高的没有国界的友谊的关切，另一方面他也强烈地体会到一个弱国的国民在强国面前的委屈。深沉的、敏感的鲁迅是不能忘怀藤野先生对他那种平凡而又无私的关怀的，这种关怀直到以后很久还成为对他的鞭策和鼓励。但正如大家所已经熟知的，当有一次鲁迅在电影里看到日俄战争中一个中国籍的侦探，被日本人杀头示众，而围着观看的，也还有“神情麻木”的中国人时，鲁迅在极深的刺激下便打破了他用医学来疗救中国的好梦而转向了文学。

虽然鲁迅幻想经过文学来改造“国民精神”，使中国走向强盛，这种想法也还有着唯心论的启蒙主义的性质，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科学，曾经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作为革命的一种助力，它的动员和改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从自然科学的医学转向社会科学的文学，应该说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的步伐。

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无产阶级还十分幼小使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象“五四”那样彻底和大规模的

思想改革运动的基础。这种情形，反映到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就是：当时许多人都热中于表面的所谓“实学”，他们虽然也代表着一定程度的民主主义的要求，但他们往往同时是带着浓厚的封建性的，他们对于比较急进比较有深远意义的思想改革自然不能接受。主要也就因为这样，鲁迅和少数同道所从事的文艺运动（出版杂志和译印小说）便得到了使鲁迅感到非常苦痛的冷淡的待遇。

但直到现在还保存下来的，鲁迅在一九〇七年间撰述的几篇论文，使我们有可能更具体地认识鲁迅当时的精神面貌。这些论文直到现在还没有使我们感到生疏，它深邃的思想和炽烈的战斗热情直到现在还是跃然纸上，也和鲁迅本人后来的活动一脉相连的。这些论文使我们想起十九世纪俄国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例如年青的杜布洛柳甫夫他们。在《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里，表现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革命的世界观，和他对于文学的伟大理想。他那段对世界的革命辩证法的解释是大家所熟知的。这段话之所以吸引我们，因为它不是一种冷淡的知识，而是鲁迅当时的思想和经验的结晶：

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

（《坟·摩罗诗力说》）

在鲁迅看来，斗争是永恒的绝对的，而所谓和平是暂时的相对的。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这个概念本身便反映了革命的要求，发散着强烈的战斗的气息。只有一个渴望着改变当时的现实而无所牵挂的人，才可能承认并提出这样的思想。

从这种革命的世界观出发，鲁迅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同

过去封建传统的观念是完全对立的。鲁迅批判了过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严厉地呵斥了老庄之辈对于古国的倒退的幻想。“古民曼衍播迁，其为争抗劬劳，纵不厉于今，而视今必无所减……”（同上）在鲁迅看来，人类的历史，包括还没有出现阶级以前的远古的历史，都是充满着斗争的。鲁迅认为社会的进化不能“拂逆”，文学适应着社会的进化应该是斗争的，然而“有人撻人，或有人得撻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尽全力死之；有人撻我，或有能撻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尽全力死之……”（同上）在鲁迅看来，一切天才，一切斗争的思想和文艺，一向是和过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还没有觉悟的群众的思想习惯相冲突的。鲁迅在这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达到了朴素唯物论的了解。

鲁迅继续告诉我们，统治阶级是不能把文学全部消灭的，于是它便使用了适合于它的利益的文艺政策。（“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鲁迅在这里批判了过去所谓“思无邪”一类文艺思想，并指出了它的阶级的实质。

鲁迅站在他那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的高峰，也批判了封建时代的文学创作。鲁迅对于屈原是抱着较大的敬意的，但他也指出他缺少“反抗挑战”，而未能满足鲁迅当时战斗的文学的要求。

惟灵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侧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同上）

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的需要，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介绍了普希

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密克威支、斯洛伐支奇、克拉甸斯奇、裴多菲这些外国的民主主义的作者。鲁迅认为他们都是“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不但对于他们的作品，而且首先对于他们那种斗争的用血与火的语言写成的历史，都是十分向往的。

在《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里，鲁迅更进一步地发挥了他的社会思想。鲁迅猛烈地抨击当时封建阶级只知所谓“富国强兵”，以及他们所玩弄的所谓“君主立宪”的假民主的把戏。鲁迅也看出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腐败和没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发的宗教虔诚，义侠血性和俗人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计较的冰水之中。它把人底资格变成了交换价值……”（《共产党宣言》），而鲁迅却说：“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坟·文化偏至论》）。鲁迅既然看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腐败与没落，因而在他看来，它那些在中国的更浅薄的追随者便都是些“轻才小慧之徒”，都是些“盲子”，他们致命的弱点就在于“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鲁迅在主观上是希望中国避免重复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的。

当然，鲁迅当时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心目中的“十九世纪大潮”还只是尼采、叔本华、易卜生这些人的思想，他对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所在，对于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他暂时还是无法知道，或者不很了然的。鲁迅只能撷取尼采、叔本华、易卜生等人思想中的反抗资本主义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

武器，于是提出了“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样的口号，这是对于当时的庸俗的唯物论、对于“庸众”和对于假民主的反抗，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但在这些思想里也有着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性质，这一方面正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性格，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群众的不觉悟或觉悟不足，以致一个先觉的思想家还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革命的力量。

有着以上这种思想的年青的鲁迅，坚决投身当时的革命运动，他和当时侨居东京的革命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还参加了以章太炎等人为领导者的光复会。在辛亥革命的干部中，鲁迅对章太炎的敬爱是最深切的，还在他东渡日本以前，他在帝国主义狱中的诗作便曾经感动了鲁迅，在决定改学文学以后，鲁迅又曾经与许寿裳等人听他讲学。然而鲁迅的景仰章太炎，“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一九〇九年，二十九岁的鲁迅回到中国，这以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一一年，以孙中山为领导人物的辛亥资产阶级革命便爆发了。革命的爆发曾经使鲁迅很兴奋、激动。那时鲁迅正在绍兴中学堂里教书，他曾经亲自把他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武装演说队”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并且欢迎当时的革命军。

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次革命的弱点很快便暴露出来，并且为鲁迅所实际地体验到了。当许多过去的革命党人都太早地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鲁迅便痛感到当时革命对反革命实行无原则的妥协的错误，鲁迅看到许多原来反革命和不革命的人在辛亥以后都一起说自己是所谓“草字头一路的人”，表示所谓“咸与维新”；鲁迅看到了一些原是下层出身的

革命者逐渐蜕化，看到了地方上仍然是所谓绅、商掌握了实权。而一九一二年二月孙中山的让位给袁世凯则集中地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善于妥协，结果使已经掌握在革命方面的政权又实际重新拱手送回封建统治阶级的手里。“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当时中国的状况就正如鲁迅在他追悼范爱农的诗里所说的。

范爱农是鲁迅在日本时的旧友，是辛亥时期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学生。就因为他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他在辛亥前回国后便受尽种种轻蔑、排斥与迫害，弄到生活非常潦倒。但革命以后不久，范爱农“又成了革命前的范爱农”了，终至于在酒后淹死，还不知道是失足还是自杀。范爱农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范爱农的悲剧也多少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悲剧。鲁迅追悼范爱农的一首诗是这样的：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鲁迅在另一首同是追悼范爱农的诗里还有“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这样的诗句。这不仅是追悼范爱农个人的诗句，而且也是追悼当时死去了的革命的诗句。鲁迅是充分地认识到辛亥革命结果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状况，中国仍然处于黑暗、混沌之中，因而自己感到深沉的苦痛的。

然而中国的历史注定要走一条曲折苦痛的道路。当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长成，暂时还不能代替资产阶级起来领导中国革命以前，中国革命的面貌，暂时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宣告无力解救中国，而新民主主义还没有到来的这个“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的年代，鲁迅所感受的苦痛是深重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的苦闷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苦闷，反映了当时一切清醒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对于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掉了一切幻想，但又暂时未能找到新的出路而引起的苦闷。

历史给中国安排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完全新型的与过去根本不同的革命的到来，而这样的革命是到来了，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然而，长久的失望、怀疑、苦痛，对鲁迅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如鲁迅自己所告白的，他开始时并没有立刻接受《新青年》编者请他撰文的建议。在鲁迅当时看来，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他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一所“万难破毁”的铁屋，在他看来，这时候如果惊起了正要就死的在铁屋里昏睡的人，是只有增加他们“临终的苦楚”的。

但就从这绝望的看法，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鲁迅所关心的是那些“昏睡的人”而不是他自己。鲁迅这种“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贯穿着他一生的活动，也是这种品质保证他比别人更快地接近真理，使他避免通常知识分子所常有的主观主义和个人的独断。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就这样，“五四”唤起了鲁迅，鲁迅又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鲁迅很快便成为“五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他的创作显示了当时“文学革命的实绩”，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服从当时革命的政治，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象鲁迅那样，把文学服从革命的政治这问题提得这样鲜明、这样坚决，在当时是没有第二个的。鲁迅这种主张，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的最可宝贵的传统。

但“五四”内部各派知识分子很快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象胡适一类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很快便从文化革命战线上溃退；一部分属于工人阶级的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原来属于小资产阶级而现在开始转向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便参加了实际的政治活动。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实质。“五四”这种内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显示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中国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这时候，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论》）。而小资产阶级呢？它不是依附资产阶级便要依附工人阶级，它是不可能有什么自己独立的道路的。而坚决地反对封建，和旧的自己出身的封建阶级早已分手的鲁迅，却暂时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当时已经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就因为这样，他在“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裂面前感到格外的彷徨、孤单，也是可以理解的。所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正是当时他那种境况的写照。